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欧洲共产主义” 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琦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Santiago Carrillo
“EUROCOMUNISMO” Y ESTADO

Editorial Critica

Barcelona

1977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 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219

1982年1月第2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20 千

印数 1—6,800 册

印张 5 1/8

定价 0.63 元

目 录

前言	1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5
二 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20
三 国家强制工具	41
四 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	68
五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	99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28

前 言

由于情况特殊，我比较有空，而且也有兴致，于是我便对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任何探索都有点冒险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1976年2月，我跨进西班牙国境时，就知当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允许我在国内露面，迫使我继续过一种完全处于地下的生活。我打算一方面积极和同志们一起商定各项政治决策，为出现一个适应民主制度的共产党而进行工作，另一方面逐步打破处于地下的状况，争取我作为西班牙公民的权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不得不采取的活动方式会使我有时间来进一步研究一个时期以来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并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一位朋友乐于向我提供使用其藏书的方便。他的藏书种类繁多，数量众多。尽管在西班牙书刊检查制度的限制下，我想引用和注明出处以及核实记忆而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不齐全，但我最关心的论证国家问题的书籍还是很多。一部分书用处不大，而另一些却很有用。倘使我能自由活动，引用的材料定能更加可靠，我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不过一旦能自由活动，我便难以有时间做这件工作了。反正总得有所取舍。

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题为《论国家》的报告时，告诉听众，如果认为报告不够明确，说服力不充分，也不必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

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① *

作为才学浅薄的自修者，我想对此作一点小小的补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本身也有含糊不清的地方，甚至有时还有矛盾（至少是形式上的矛盾），这就可能在读者中产生疑问，至少是引起思索。这个课题已被搞得如此之乱！如果从实践中去观察，那末，矛盾和混乱还更严重。因为列宁在关于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列宁在世时在实际中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国家（更不必说他死后的那种国家）之间，有着种种根本的区别。

我在本书中经常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提法，读者也许感到奇怪。这一提法现在十分流行，尽管并非共产党人所创造，且其科学价值也还是值得怀疑。但在舆论中，它已经有了一种含义，并且一般说来，成了目前各种共产主义倾向之一。这种思潮到目前为止，与其说表现为一种理论主张，不如说表现为对政策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如果它还有些不确切，那末，这种不确切性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探索得还不具体而造成的。这一情况再次表明，实践通常领先于理论，而理论又是实践的概括。当然在理论指导实践，给予科学的严格性，并广泛地阐明其作用的情况下，实践也就会具有可靠的依据和根本的内容。

然而，“欧洲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政策和理论主张，确定了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虽然在根本上对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效），力图使得具有当代特点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

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公开明显地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矛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1页。

* 着重号系卡里略所加。——译者

盾，是形成上述进程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反映。其中显然包括有关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有些地方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下采取种种特有的途径建立政权而造成的，其中强行并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被造成的政治状况，不是总能符合当地种族和历史状况的；凌驾于这些矛盾之上的，还有新的矛盾，即由于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利害不同以及由于列宁早就说过的无产阶级并不会因夺取了政权就变成圣人而出现的矛盾。然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问题与矛盾也渊源于各种道路、具体情况、文化传统影响、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造成了实际存在多种政治思想倾向的状况。当革命进程带着巨大的差异扩展到全世界，这些不同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存在不同的倾向是今天的现实。用“实行统一的命令”也好，用革出教门也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世界化的漫长过程（谁也无法预言需要多少时间）中，逐步消除这些倾向。

这就是被确认为现实的，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尽管至今我们还没有给它找到更好的提法。应该指出，这一倾向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特点，并曾在1976年6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有所表示；但它既不是一个组织，也未曾制订任何的共同纲领。

这并不是要宣传一种第三条道路。如果把世界革命进程采取的各种不同的道路都罗列出来，则人们所知道的就远远不止三种。

这也不是向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倒退，也不是否定产生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原因。

必须承认，本书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不同于列宁在1917年和1918年的论点。列宁的论点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于当时

的其他各国，然而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客观上壮大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有的人读到列宁的某些论点已被超越之时，也许觉得这是亵渎。这种人不知道列宁对马克思的某些论点也讲过同样的话，而且苏联的列宁的继承者也曾公开修正列宁的某些论点。

我于1976年12月22日在马德里被捕，中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写作。一星期后我获释出狱，成了合法的公民，于是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时间进一步修改我的写作，只在付印前粗糙地审阅了一遍。我相信书中的缺陷和不足，将在今后对这一如此重要和决定性的课题的辩论中得到克服。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国家政权的问题继续是一切革命的问题

开始下笔，我就想立即概要地阐明这个我要提出的棘手问题，仅仅是为了引起辩论，促使更加高明的有识之士继续这一工作，即使我完全被压倒也心甘情愿。这里谈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具体论及前途方面提出的（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瑞典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体类似地提出的）关于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课题。这些党并不企图充当榜样，目前正在按照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制订一条革新的路线。

关于这一路线，某些信仰相同的人以及许多观点敌对的人，都写了严厉批评的文章。信仰相同的人谴责我们是机会主义，为了“民族主义”而放弃了国际主义，是“反苏主义”，抛弃“阶级立场”。总之，象谈论“恐怖主义者”一样地把我们说成是某种概念不清的东西，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读者在回忆中，也许不曾忘记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大量散布谴责我们的文章和讲话。

而我们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某些盟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攻击我们，或对我们有所保留。他们表示，这可能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便于取得其他民主力量的谅解，走出处于地下的小圈子，或者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为更方便地上台执政打开道路，等到一旦执政，我们强大了，就会“摘去假面具，采取强硬手段”。

我在这里不过对上述两种人的批评作一简单综述，各种批评常有极其细微的区别，但是其根本意思就是这样。

这些批评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无数的批评是存心不良，不正派的。但是，我并不低估这些批评不仅在某些工人和人民群众以及在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即在中等阶层里，甚至还在我们自己党内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可能有人认为我们若非已经陷入的话，也正处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边缘而危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有些同志也可能相反地认为，我们的方针实际上是在特定时期，为了统统占为己有而采取的一种权术，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态度。

纵然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刚刚痛苦而茫然地摆脱了四十年独裁统治的国家里，各个政党（不包括我们党）在运用政策方面习惯于采取一切能在策略上有利于自己兴旺强固的手段，不必过多地顾及原则。对于这些党，人们无论如何都能原谅的。它们可以采取这些对它们有效的方法，因为人们相信，即使这些政党取胜，它们也是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与此相反，共产党人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得不到那样的容忍。人所共知，我们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的，我们并不对此故弄玄虚。许多人害怕我们也将不可逆转地破坏种种政治权利，并取消在野派的权利，因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

为了实现我们所主张的道路（即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将保持和丰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人权，并赋予这些权利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内容，民主权利和人权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无法否认的历史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仅仅抛开我们的理论家创造的某些公式（比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仅仅声称我们遵守民主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处的世界形势，对生产资料取得进步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其推动的新的社会

结构，进行贯通全局的分析，尤其要对目前的国家，特别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也要批判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

如果我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观点，来证明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民主化，并把它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工具而不必采用暴力从根本上加以摧毁，那末有人就会说我们是策略主义，或者把我们比作社会民主党。

因为国家机器就其整体来说，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是一种精心使用的工具。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国家并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不是各阶级的仲裁人。然而有一种思想却竭力持与此相反的论点，以不同说法表达的这种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而由法西斯主义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改造国家机器，任何社会主义改造都搞不好，甚至白搞。尊重选举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却不是选举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会受到在理论上保卫法制的那些人的有力的打击。

智利的经验表明，在准备尝试社会主义的人民团结政府执政时，国家机器仍然是一个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各种机构和多国公司深刻渗透的资本家的统治工具。一当形势有利，这部机器就来了一个大翻个儿，取消了民主宪法，建立了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国家当前有些什么特点？如何加以改造呢？这就是一切革命的问题之所在，也是我们准备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这种道路实行的那种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够无视的。

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很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按我的愚见，他们是草率和匆忙提出的）民主概念，也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值得的。通过这种或那种

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现在已有好几种例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连宗教神话都发生了危机，因而我们不能神化这些社会，而要研究它们的经验，以便摆脱我们的导师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少带着一些预卜空想的那种状态。他们那时没有掌握现在的经验，因而无法更深刻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上所会遇到的艰难险阻，以至某些情况下的局限。

另一方面，当我们陷于主观性，质而言之亦即陷于唯心主义的时候，某些容易忘却的事情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比如生产资料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个发展程度是不顾我们的意志而在客观上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实际内容的。

生产关系告诉我们社会的性质，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在有形的生产关系之外，最终决定生产关系内容的真理也在于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具体发展程度。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能具有某些表面形式——要在我们常常讲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各种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表面形式。总之，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尽管这是根本的)，还不能算是站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还必须认识另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因素，即生产资料发展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历史上，有时阶级斗争的高潮会造成超越生产资料发展程度的暂时飞跃；但是归根结蒂，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资料发展这一因素会重新发挥作用，并会使阶级斗争在关键时刻造成的飞跃失去平衡，变质，甚至成了问题。

在一定的限度内，上层建筑确实有自主性。但是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并不是无限的。掌握政权的领导人有时忘掉了制约上层建筑的各种条件，他们以为发号施令的工具以及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就可以决定一切，不受任何束缚，不受任何客观规律的制约。总之，他们专横武断地行事，每当他们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可能时，就需要找出替罪羊来对此负责。那些出于好心的评论家仅仅从伦理

的观点试图对这些或那些错误和反常现象作出判断，他们从反面角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当代背景的情况下，探讨这些问题决不意味着不要革命，不要社会主义。

这不是空想（即那些在一个时期中鼓舞着我们的种种神话）同迄今各国革命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之间有差距，以及同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进展之间有差距，从而产生失望和幻灭的结果——至少在我来说不是如此。我今天信仰着二十岁时信仰的一切，而且在根本上还怀着那时候的幻想，我认为现在的根据更多了。有的人抛弃了这种幻想，我对此感到痛心和失望。

尽管有着各种错误和异常，正是由于各国的革命以及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进展，历史才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历史进程确实是在巨大的不正常现象中发展的。人类的意志和社会科学在克服和控制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后果方面应该越来越起作用。但是否认进步，妄自菲薄，失望泄气，站在一旁计算受到挫败的次数并预言今后的灾难，这样就不配是真正的革命者。

我尊重评头品足的人，他们可以并且正在起一种有用的作用，提醒注意政治不应超越的界限，他们也算是是非的判断者吧。但如果要由他们来搞政治的话，很可能会落得一个上保守势力绞刑架的结局，要不然就是为躲避风险而逃离职守。他们定会造成严重得多的灾难。

我讲这番话不是想否认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改变了看法，也不是否认有时对我提醒（或对我指责）的人是有道理的。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改变了好些以前维护过的观点。不时有人怀疑这种看法的变化是否真诚，这些人是没有道理的。其中许多人的看法确实没有任何根本变化，他们自以为，世界和我们在结束了一个周期之后，又回到了历来固有的位置。他们不知道周期似乎在接近他们，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而是螺旋形上升，并越来越离开他们。人的自

然倾向，尤其是为事业而殊死斗争的具有特性的人的自然倾向，是“保持本性而不是反复无常”。我们在战斗事业中的特性和坚定性，我想人们是无法否定的。既然我们改变倾向，那就是因为我们取得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而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又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宝贵的一点倒不是我们自己学到了一点东西，并敢讲出来；最宝贵的一点也许是凭借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能在纠正方向时享有一种别人因缺少这种经历而不具有资格。

我们这些在判断一系列问题方面有了变化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人数很多，可以说除极少的例外，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变化。还可以说（尽管这个说法看来是冒失的）变化最大的人恰恰是那些看来根本没有变化的人，是那些鹦鹉学舌似地重复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前的公式的人。那时候的公式是一些针对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情况的概念，其实质内容也不同于目前发起革命所需要的主张。同样的词汇，同样的公式，今天的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这些说法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成了内容保守、一事无成的东西。尽管重复这些说法的人，可能也是那种没有意识到事物发生了变化的老实人，然而他们却更多地使人想起官办宗教的司仪牧师，而不象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进行斗争的革命者。更不用说有人还象为了保持自己的等级或是为了向上爬而一味听从命令的放荡的牧师。

我深信，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改变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正努力在实际经历中进行学习，紧紧抓住具体情况，从中引出切合于当代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方针。我们恰恰是在根本上没有起变化的人。我们继续感到肩负着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责任，我们无保留地献身于捍卫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工人运动史上曾发生过多有次的有名论战——其中最有名的是恩格斯同杜林，考茨基同伯恩斯坦，列宁同考茨基的论战。“修正

主义”一词因而声名狼藉。现在有人企图用这个提法，加在根据具体斗争所处的实际情况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而改变某些观点的我们这些人头上。

然而他们忘了，曾经有过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修正主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①

“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②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自我修正的，革命者也是这样。列宁修正过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并创立了比如说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利用其最薄弱的环节的理论，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理论基础。考茨基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断定俄国在1917年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并未取得高度发展。然而考茨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用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危机。

列宁也曾多次作过自我修正。1919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修正了以前全部的经济政策。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讲演中，谈到农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② 同上书，第607页。

民苏维埃而不是俄国的工人苏维埃，这也是考虑到中国具体情况而对苏联本身的经验进行了一次修正。掌握了政权，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接受并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这难道不也是修正吗？

自称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用苏共机构通过决议的办法，毫不费力地修正和取消了列宁阐明的种种理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赞同之下不仅修正了而且谴责了（这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某些做法和想法。现在的苏共领导人又修正了而且在政治上还活埋了赫鲁晓夫。

现在并不是要揭示这些接连发生的修正事件对了多少，错了多少，而是要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推断出，从相反的意义上去修正，这样做的不仅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还有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有人吊着嗓子拚命反对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其他西方党的修正主义，他们之中有些人尽管总能找出替罪羊来推卸他们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中对某些行动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他们本人也曾多次充当过修正分子——甚至修正了他们自己的著作。

我想在下面谈谈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民主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内容等问题，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今天谈论这些问题意味着怀疑我本人曾经为之申辩的某些想法和某些解决办法。我相信，我，以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在谈看法时，都会采取忠于并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态度，我们都是象以往一样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打算“伸手帮一把”没落的帝国资本主义，而是在努力加速它的灭亡；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营垒，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在继续同它战斗；我们是要拿出生活在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行动。

我们主张的解决办法无疑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是适用于我国和发展程度相似或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国家。想要在历史上从

未有过多党制、议会制的地方，比如越南、老挝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推行这些制度，提出这种要求犹如狂犬吠日。在这类地区，社会主义和民主会有不同的形式。反过来，那些要把自己的模式树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并要向我们及其他人推行的人，也在犯类似的错误。列宁关于可以有多种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天才预见，如果尚未被现实所超越，那末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就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么就是真能这样做了；要么就是搞纯意识形态（我是贬意地用这个词的），脱离实际，搞成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东西。今天，西班牙、欧洲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有着我们无法回避的种种非常具体的特殊性。如果西班牙保守势力碰到的共产党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抱着过时的看法不放，把西班牙革命仍旧看作以前其他国家革命的简单翻版，那末他们就会更加高兴了，因为这样的党势必十分脆弱，不能摆脱孤立和摆脱小圈子，不能以自己的形象来指引政治活动，不能发展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不能有助于确立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是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逝世后， 国家的结构和职能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看法是在本质上把国家看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特别强调国家的强制性性质。

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葛兰西和阿尔杜赛）还提到了意识形态工具，即不怎么用暴力而是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手段对人们意识起作用的工具。意识形态工具包括宗教（各种教会）、学校（公立和私立的各种学校）、家庭、法律、政治（由各种政党组成的政治体系）、新闻报道（报刊、广播、电视等）、文化等方面。